

IMBALANCE ADVANCE AND HIGH GROWTH

不平衡推进 与高增长

——改革进程中的浙江经济发展研究

陈自芳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不平衡推进与高增长

——改革进程中的浙江经济发展研究

陈自芳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责任编辑 卢小生

版式设计 蒋 方

责任校对 孟赤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平衡推进与高增长:改革进程中的浙江经济发展研究/陈自芳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9.6

ISBN 7-80118-800-4

I. 不… II. 陈… III. ①地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浙江 ②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浙江 IV. F12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1758 号

不平衡推进与高增长

——改革进程中的浙江经济发展研究

陈自芳 著

出版: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新街口六条红园胡同 8 号 邮编:100035)

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总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机工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9.5 印张 237 千字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7-80118-800-4/F·760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邮编:100836)

前 言

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是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所共有的现象。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不平衡现象必然更为突出。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个人由于辛勤劳动成绩大而先富起来，并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他以平实的语言，阐述了不平衡推进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提出了在改革所形成的强大动力推进下，应用宏观不平衡规律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我们要善于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充分调动一切潜在的经济能量和要素资源，以不平衡推进方式达到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经济的目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以市场化和经济主体多元化为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市场机制为动力的经济发展进程的深入，一系列创新的因素越来越成为推动高增长的主导因素。这些创新因素突出地体现在那些较早走向市场化的区域，较早崛起的非国有的多种所有制经济，适应于市场新的需求并能灵活调整的产业，尤其突出体现在异军突起的农村工业中。以创新因素为先导，带动经济整体加速发展。从时间序列看，在一些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通过抓住改革和发展的机遇，在波动中实现经济加速上台阶，又是高增长区域共同的经验。显然，一部分领域以先发性、先导性的创新得到加速发展，与另一些领域的相对滞后并存；经济增长在一段时期的高速，与另一段时期的低速交替出现，构成了不平衡推进的基本形态。这种不平衡是与体制转

轨、市场化进程、经济发展机制的转变、社会生活方式及意识形态的更新等方面存在的不平衡相同步的。总之，改革是不平衡的，改革效应在各个领域的不平衡性形成了总体高速增长中的不平衡性，从而亦引起分配领域“一部分人先富”的不平衡性。如果说经济的不平衡在各国各区域是普遍存在的规律，则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定的高速增长阶段，在浙江这样一个改革的驱动效应较为强烈的省份，不平衡表现得更为显著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本书以改革以来浙江经济的发展进程为对象，研究了以不平衡方式推进经济高速增长中的规律和经验，力图揭示是哪些领域、哪些因素在改革效应下得到加速发展，其推进效应的特征和机理是如何体现的，市场主体和政府在这种推进中有哪些有益的经验。同时，从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今后发展的宗旨出发，也着力于研究在这种不平衡推进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包括高速增长的强势领域在发展中已经或将要遇到的新的挑战，以及相对低增长的弱势领域在不平衡推进格局中面临的可能导致进一步滞后的问题。笔者以为，研究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比总结以往的经验更为重要。在分析的基础上，也试图在各章节有针对性地提出发扬成绩、运用经验、解决问题、迎接新挑战的对策。这种对策主要是从进一步改善政府调控的角度提出的。由于新情况、新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这些对策建议是粗线条的，希望能对宏观决策者有一点参考价值。

本书分为六章。第一章既是全书分析的起点，也是对以后各章内容的高度概括，分析了邓小平不平衡推进经济发展思想的深刻内涵，在此基础上全面论述了邓小平上述思想在浙江改革进程中的具体表现和特定规律性，以及迎接新挑战的战略思路。第二、三、四章分别从省内各区域经济、各种所有制经济、不同产业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时间序列上的经济波动中体现的不平衡推进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研究。第六章集中分析了浙江不平衡推进

的强势主流——农村工业化进程。农村工业的高速发展包容了浙江经济发展中的所有各种创新因素的强大效应，有助于更具体地理解不平衡推进的动因和规律。

本书在方法上将规范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相结合，以实证分析为主，注重应用系统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全书共计 63 张图表。统计数据来源主要是国家、省和地市统计局历年编制的综合性统计年鉴，以及各种专项统计年鉴、资料汇编、普查资料和定期的统计公报。由于数量众多，书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望读者谅解。此外，本书也注重运用比较和分析的方法，如对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包括本省与全国）、不同所有制、不同产业的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有利于发现规律。本书虽主要是研究浙江经济的发展进程，但由于制度变革所推进的发展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进行的，全国各省份的情况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因而相信其他省份的读者也能从对浙江的研究中得到启发，深入研究本省、本区域的问题。希望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有更多深入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著作问世。

作 者

1999 年 3 月



作者简介

陈自芳，男，1949年出生于上海，1982年南开大学经济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教授。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已独立或合作出版著作8部，在国家及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邓小平不平衡推进经济发展思想与浙江经济	(1)
§ 1 邓小平不平衡推进经济发展思想的丰富内涵	(2)
§ 2 邓小平不平衡推进经济发展思想在浙江的实践	(11)
§ 3 90 年代中期以来浙江经济面临的新挑战	(28)
§ 4 不平衡发展现状下的政府调控方针对策选择	(35)
第二章 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态势研究	(51)
§ 1 浙江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的数量分析	(51)
§ 2 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变动特征分析	(69)
§ 3 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空间因素分析	(76)
§ 4 从产业结构看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	(79)
§ 5 从固定资产投资看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	(91)
§ 6 从若干指标看浙江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 特征和潜在问题	(96)
§ 7 浙江区域经济相对非极化不平衡发展的机理 与效应	(102)
§ 8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变动的未来走势分析及 调控对策	(113)
第三章 浙江各种所有制经济不平衡发展态势研究	(118)
§ 1 改革以来浙江不同所有制工业发展态势分析	(119)
§ 2 浙江省不同所有制工业增长要素分析	(137)

§ 3	浙江不同所有制工业发展态势成因的深层次分析比较	(155)
§ 4	不同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展望	(164)
第四章	浙江省产业不平衡发展效应及调控对策	(169)
§ 1	浙江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征	(169)
§ 2	浙江产业发展不平衡态势的经济学分析	(186)
§ 3	浙江产业结构优化、强势发展的战略选择	(195)
第五章	改革以来浙江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研究	(205)
§ 1	改革以来浙江经济增长波动周期特征分析	(206)
§ 2	改革以来浙江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	(211)
§ 3	改革以来浙江经济波动减弱的原因	(216)
§ 4	改革以来浙江经济比全国位势高波动大的成因分析	(222)
§ 5	改革以来经济波动对浙江经济的影响	(226)
§ 6	浙江经济实现常态波动的对策	(239)
第六章	农村工业迅猛崛起：浙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强势主流	(246)
§ 1	“增长奇迹”发生动因的理论思考	(247)
§ 2	浙江农村工业化的重大意义及其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266)
§ 3	勇攀高峰——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唯一选择	(282)
后 记		(296)

第一章 邓小平不平衡推进经济发展 思想与浙江经济

邓小平同志是一个充满辩证思维的伟大战略家，这在他的经济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确，其中不平衡推进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堪称典范。事物总体上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向前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任何人不可能改变。一国经济的发展必然遵循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在以一般速度增长时是这样，在以高速度增长时，不平衡性必然更为明显。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发挥后发性优势，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在低起点上突发性地实行加速，其不平衡性更显现出广泛而强烈的特征。如果过度抑制不平衡性，将阻碍经济的发展。然而，不平衡必须有一定的度，而不能超出这个度，否则也必然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在我国原有体制下，由于受到教条主义和“左”的思维方式影响，一方面力图以“一大二公”和平均主义原则来体现“社会主义”特征，维护体制和分配格局上的绝对平衡；另一方面又不切实际地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其结果是总量和结构上都出现严重的超常失衡，经济上难以为继，建国后前三十年经历多次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使国民经济遭受到重大损失。

邓小平的不平衡经济发展战略，则是在深入研究和严格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前提下，针对我们这样一个基础薄弱、经济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后提出的。在生产水平较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加速发展的战略问题上，他提出的思想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和创新意义。

§ 1 邓小平不平衡推进经济发展思想的丰富内涵

不平衡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种意义上理解：一是在时间上展现的经济发展速度一段时期较快，一段时期较慢，呈现周期性特点。二是在空间上展现的一些领域（区域、产业、企业、个人等）发展较快，人们的收入较高，另一些领域发展速度较慢，人们的收入较低。在这两方面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较明确论述。由于时代条件和实践基础的不同，邓小平的理论显示更为完整和丰富，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创造性的发展。

毛泽东早就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作过论述。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写道：“不平衡是普通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毛泽东提出国民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其着眼点更着重在时间序列上的阶段性特点，即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谈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就是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波浪式的特点，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有时高、有时低，投资规模有时大、有时小，而不是始终以一种速度发展。但毛泽东在运用这种不平衡发展规律时，往往未能准确和适时地控制经济发展所应有的“度”，而造成如1958～1960年那样经济的大起大落。

毛泽东也对空间意义上的不平衡发展作过论述。他的《论十大关系》论述了重、轻、农业之间，沿海和内地工业之间，经济

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就是对这些不平衡规律的探讨，并提出了避免过度不平衡性的问题。他认为应通过政府的调节，加强不平衡发展中相对薄弱的方面，实现均衡发展，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例如他认为，虽然重工业“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你对发展重工业“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但毛泽东在实践中也往往出现两种偏向：要么过度地强化主导方面，如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过分强调国防建设而牺牲了全面的经济建设（如三线建设的失误）；过分强调国家的收益而忽视了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等等。要么过度地强调平衡发展，而抑制了不平衡发展规律正常地发挥作用。如在沿海和内地关系上，采取拆东补西的办法，大量拆迁沿海企业到中、西部欠发达区域。其主观意图是以沿海企业带动内地，使东、中、西部共同发展，但实际结果却是不但未起到应有的带动作用，反而使沿海企业和沿海经济被拖累甚至拖垮了。

邓小平的不平衡发展思想，是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考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发展后形成的。其鲜明特点是注重实践性，即不是一般地提出理论观点，而是针对实践过程中的客观趋势和必然规律，切实地从战略方针、政策取向乃至操作性的层面上提出不平衡发展的总体构想，充分体现了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时间序列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方面，邓小平提出，经济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争取“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认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这个问题上，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思想的区别在于：其一，邓小平的加快发展和“上台阶”理论重视必要的条件，强调“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而不是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高速度。其二，邓小平强调加快发展有必要的前提，即“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而不是只追求高速度，搞大规模的粗放式增长。其三，邓小平强调加快发展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他说，1984~1988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如果违背客观规律，用革命战争时期大搞群众运动的“人海战术”来搞经济建设，必然会破坏经济有机体，使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其四，邓小平强调推动加快发展的动力主要不是靠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而是靠科技和教育。他认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如果不注重科技和教育以推进内涵式增长，必然是盲目投入搞粗放式增长，其结果是增长越快损失越大。其五，邓小平强调的加快发展并不忽视平衡发展的要求，而是主张发展一段后，就应当“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①。这种调整是“自觉的、清醒的调整”，而不是在追求高速度时不顾比例协调，待到出现严重经济困难时才被迫进行调整。

邓小平关于时间序列上的不平衡发展的思想促成了1992年以后我国经济的加速发展。以浙江农村工业化为例，在此期间迈上了决定性的大台阶。1991年，农村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8.3%，经过短短的三年，1994年即达到76.5%，多种经济成份、经济形式的大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些原有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如浙江省的温州、台州、绍兴、金华等地区）的

① 以上引文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378页。

面貌。没有 1992~1994 这三年的跳跃式发展，就没有浙江低通胀高增长的今天。同时也应看到，这次高速增长后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由于 1993 年年中开始的宏观调控，使经济过热的倾向及时得以纠正，到 1996 年实现了“软着陆”。这次加速上台阶后的调整，正是邓小平主张加速发展一段后就应当“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的一次成功实践。没有邓小平有关理论的指导，也许就没有这次成功的实践。邓小平在总结 1984~1988 年这五年的高速发展经验时指出：“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这些论述对于 1992 年以后的加速发展进程无疑也是贴切的。可以预见，有了邓小平“加速上台阶——及时调整”的系统思想指导，又有在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成功的实践经验，我国经济在未来实现小波动高增长的目标将有充分的保证。

邓小平的不平衡推进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更为丰富的内容，是围绕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展开的。其对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是 80 年代以来所有革命性变革中关键性的一大突破。

在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劳动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人们十分注意这一新鲜观点。或许是由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在分配领域具有很强的敏感性，人们常常仅将它作为一个重大的收入分配政策，而忽略了对报告中紧接着的一段更为事关全局的话的充分注意，即：“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回顾近二十年改革的历程我们就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上述思想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在于其中贯穿的不平衡发

展思想。它以分配上的变革为触发点，形成巨大的扩散性效应，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人为的同步推进的僵化模式，而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战略上均形成了一系列创新。这确实是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是对毛泽东的不平衡发展思想的创新和发展。

邓小平在酝酿这一重大政策原则时，是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对实行这一政策的宏观效应的具体预测后才作出决断的。据于光远同志回顾，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过多次常委听取各分组汇报的会议。在一次会议上，他就允许一部分地区、企业、职工、社员先富起来的观点作了长篇讲话，把它和“给下面更多的权利”并列作为两大政策。他还计算了一下，如果有5%的县、5%的人口搞得比较富，全国就有100个县、4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国家。如果有10%的县和人口，那就是一个大国了。他一个一个地讲估计可以先富起来的地区，并且指出这些地区可以先富起来的条件。例如，他提出的那些地区中，第一个便是深圳。他认为深圳可以先富起来的条件便是对外贸易。事实正如小平同志所预见的，改革开放之后短短数年，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在深圳这块土地上矗立起来，深圳人先富起来，成为全国人民以改革求发展的表率。^①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让一部分人在社会劳动成果的总量中获得较多的份额，而其前提也就是让一部分生产要素的组合点优先成为新的、以较快速度发展的增长点。这部分生产要素是优质的生产要素，它们的组合形成高于社会一般水平的先进生产力，由此也必然造成一部分劳动者与经营者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部门、所有制组合、企业和个人对整个社会起到强

^① 转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8年第12期记者李庆华采访文。

大的激励、榜样和扶持作用。实践证明，在推动社会相对落后的部分加快发展的方式上，先富者的带动比以往政府的刻意扶持，包括传统的“扶贫”方式更为有效和长久。

经济发展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而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的不平衡又更为突出。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客观现实。地区经济环境优劣不平衡，不同产业发展条件不平衡，不同所有制发展不平衡，个人及社会群体之间的创新能力不平衡，科技及生产要素的分布不平衡等等，正是当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在这种不平衡的基础上展开的，我们只能在历史赋予我们的条件下从事建设。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个人在致富方面的主客观条件大不相同，如果不允许已经具备条件的人先富起来，那就是要他们向还没有具备条件的地区、企业、个人看齐，也就是“他穷我也穷”，而“向穷看齐”是完全要不得的。打破这个“大家都穷”的愚蠢方针，才有不断的发展和富裕。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要求以不平衡的形态推进经济发展，客观现实的不平衡性更要求我们注重运用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来使各种生产要素都能尽可能地在帕累托最优状态下组合起来，形成次第有序的层次，分步推进发展的进程。

总体来说，邓小平在其公开论述中，并没有具体说明究竟哪些地区、企业、个人将“先富起来”，因为这是难以由人为作出规定的。作为一个高度重视实践的领袖人物，他提出了不平衡发展的总体设想，而由实践去决定究竟哪些领域、哪些群体和个人会在这一政策下因其自身的活力、创造力和付出的辛勤劳动而优先发展起来。今天，我们从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模式 and 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理解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所蕴含的不平衡发展的内涵，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以来发展最快的，主要是在原有

体制外被旧体制所压抑的生产要素。在新的经济模式和政策效应激发之下，这些生产要素首先得到优化组合，其能量得以极大地释放，成为推动加速增长的强劲动力。不平衡发展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一部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到“计划忽视”的领域（区域、企业、个人等）中的生产要素，在市场化过程中凭借其与市场的亲和力，在市场带动下加速发展

计划只可能局限于某一些领域，而市场的力量是广泛分布，无所不在的。它能够渗透到一切领域，并且能够因其“乘数－加速数效应”而无限地扩张。一部分人首先看到了大量原先计划经济“无暇顾及”的领域在市场架构下处于空缺状态，谁先进入谁就能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市场化初期那些首先闯入市场的“弄潮儿”，在对计划经济的短缺造成的欠债进行补偿的需求拉动下，获得了强大的经营动力和广泛的获利机会。其进入市场的资本和技术门槛也很低。尤其对于以广大农民为主的“体制外”群体来说，只需付出很低甚至无需任何机会成本。他们在先发性市场化的机遇中容易取得骄人业绩。这一部分要素的生产率明显高于其他要素，其代表者自然而然得到“先富起来”的待遇。

2. 一部分在传统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教条”压抑下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股份合作制、个体、私营经济及“三资”企业，在允许各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政策环境中，以其产权明晰、权责明确、利益机制强有力的优点，形成对生产要素的强大发掘和利用能力

计划经济下的国有和城镇集体经济所未能组合进去的生产要素被多种所有制形式加以组合后，普遍具有了更为强大的活力和扩张能力。同时，由于集体、个体、私营及“三资”企业绝大多数处于计划体制之外，其发展只能依赖市场。这当初看来是出于无奈的不利因素，结果反而成为有利于多种所有制发展的条件。